

思考中國近代性問題或許有啟發性。麻風病在宋代以後的發展，無論從傳統醫學的角度，還是社會反應的角度，中國的確已進入新的理性時代。人痘接種法的傳播也說明，自晚明起中國社會疾病觀、身體觀經歷了重要變化，其間有新制度，也有新理論和觀念的產生。我們是否過分忽略或低估了中國在19世紀以前不同歷史階段的「近代性」？

段雪玉

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

郝平，《丁戊奇荒：光緒初年山西災荒與救濟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，315頁。

20世紀90年代以來，災荒史作為社會史的分支，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。在對災荒史的個案研究中，發生在1876年至1879年間的「丁戊奇荒」無疑吸引了許多學者的關注。1980年，何漢威的專著《光緒初年（1876-1879）華北的大旱災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80）率先就被災嚴重的華北五省的受災程度、賑濟措施及其影響等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論述。此後，前後有數十篇文章圍繞被災情形、賑濟措施、災害發生的原因及其影響等進行了詳細探討。近年來，隨着相關史料的不斷發現，有些學者對光緒初年中西方救災差異、民間賑濟特點以及近代救災模式的變遷等問題進行了分析，非常有力地推動了丁戊奇荒及晚清災害史研究向縱深發展。其中，美國學者艾志端(Kathryn Edgerton-Tarpley)所著《鐵淚圖：19世紀中國對於饑饉的文化反應》（曹曦譯，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11）即立足丁戊奇荒，以廣闊的視野考察了晚清官場與饑荒政治，民間傳說、倉儲及糧食運輸路線，危機期間性別及家庭關係等，被稱為「清代災荒史的上乘之作」。與之相比，郝平的新著《丁戊奇荒：光緒初年山西災荒與救濟研究》（以下簡稱《丁戊奇荒》），亦在積累、爬梳大量史料的基礎上，從社會史的視角出發，集中對山西一省的受災程度、各級官員及民間力量、西方勢力的救災力度進行了細緻的解讀。作者對丁戊奇荒予以「同情之理解」，生動再現了百餘年前丁戊奇荒的歷史場景，在研究的視角、方法和材料上均體現出較強的創新意識，堪稱「丁戊奇荒史研究的上乘之作」。

《丁戊奇荒》一書共分八章，圍繞三個部份展開論述。第一部份，即第

一、二章側重於對饑荒圖景的描述及受災程度的分析。第二部份為該書重點，主要探討社會各階層在賑災中的組織行為和應對措施。其中第三、四、五章分析了不同級別的官員的賑災特點，第六、七章對饑荒中的外部救援及民間賑濟力量進行了解釋。第三部份，即第八章考察了災荒的影響及時人的反思。在史料的應用上，除了方志、檔案、報刊等基本資料外，郝平更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，搜集了相當多的碑刻、歌謠、竹枝詞、唱詞等，比如反映晚清山西、陝西糧價變動的王歡樂的《豐歉年略》，反映地方官員賑災的山西平陽人梁培才的竹枝詞《丁丑大祲清官譜》等等，這些資料能補官文書之不足，有助於豐富和拓寬相關研究的內容和路徑。從內容來看，該書具有三個特點。

其一，對晚清地方行政系統救災職能的細緻解讀。清代沒有專門的救災機構，其救災機制主要依託龐大的行政機構而運行。就地方而言，從督撫、知府到州縣皆承擔着非常具體的救災職能。救災職能發揮的好壞往往成為判斷官員政績的重要標準，清代因此制定了非常詳細的獎懲則例。丁戊奇荒中，雖然義賑作為新興的賑濟力量異軍突起，但是官賑作為傳統救災的主體依然發揮着不可忽視的作用。以往雖然也有研究對曾國荃、馬丕瑤等官員在丁戊奇荒中的辦賑情況進行了分析，但對作為救災主體的整個官僚系統的運作方式，相關研究基本缺乏。郝平在《丁戊奇荒》中立足大量史料，分別高層官員與災荒救濟、中層官員中的辦賑典型、州縣官員的個人形象與救濟策略等，對賑災中各級官員的表現進行了細緻的描述和評價，非常生動地描繪了從欽差大臣、督撫、知府到州縣官等層層相因的官賑體系的具體運作。「弱朝廷強地方」似乎是晚清賑災的一個主要特點，這在丁戊奇荒的賑濟中體現得非常明顯。的確，晚清以降，隨着財政匱乏、社會動員能力下降，中央將其本應承擔的賑災職責和壓力下移到地方，從而導致了清代荒政體系的運轉失靈。由此來看，地方政府在負荷着超重的救災壓力的同時，也通過舉辦賑捐等獲得了相當的財政自主權，這也成為導致晚清中央與地方分權的重要原因。另外，作者認為，地方官員辦賑的效率除了與個人能力息息相關之外，也與各級官員整體素質密切關聯。通過對地方志的梳理，該書羅列了48位州縣官員的相關材料，並輔之以竹枝詞等史料，經過認真分析，在作者看來，作為救災的主體，山西大多數州縣官員在辦賑過程中能做到清廉公正。作者由此指出，「以往研究者將災荒損失過重的原因歸咎於地方官員的賑災不力，多少有武斷之嫌」（頁193）。晚清官賑力量逐漸式微，很多學者將吏治腐敗看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，但因此若將所有官員的辦賑目的都解釋為

中飽私囊，似也確實有失偏頗。除此之外，該書還立足曾國荃的批牘，對巡撫與州縣官員的辦賑分歧及討論進行了介紹，官僚系統的辦賑分歧會影響到賑災政策的實際推行，這些對細化救災行政系統的解讀都是很有裨益的。

其二，對饑荒中民眾應對行為方式的全面闡釋。丁戊奇荒中，由於災情奇重，山西四十餘州縣竟出現了人相食的場景。欽差大臣閻敬銘與山西巡撫曾國荃曾驚呼：「今日晉省災荒，或父子而相食，或骨肉以析骸，所在皆有，豈非人倫之大變哉？」（光緒《山西通志》，卷82，〈荒政記〉）以往研究因此多強調人相食對儒家倫理秩序的衝擊，但對大災之下普通民眾的心理缺乏細緻而全面的考量。本書在第一章第二節與第八章第一節，對災民面對饑荒的心理因應進行了闡述，作者認為，大災面前，「民眾的行為方式產生分裂，一方面是迫不得已的雞鳴狗盜、賣妻鬻子、相食人肉等行為，是對儒家教義徹底的踐踏；另一方面則始終堅守道義氣節，常態下的日常行為在這一時刻得到昇華，實現了儒家精神的回歸」（頁254）。作者依託方志材料，對災民遵從孝悌、堅守氣節，尤其是女性恪守貞潔、慷慨救人等行為進行了細緻描述。丁戊奇荒中的女性群體之命運近年來為不少學者關注。其中，美國學者艾志端指出，饑荒中女性的道德價值與市場價值成反比。選擇自殺或餓死以保持貞潔的女性，在其死後被賦予巨大的道德價值，利用自身的市場價值、允許被賣甚至自鬻者雖然喪失了道德價值，但卻能在饑荒中存活下去。那麼，到底哪一類型的女性在災荒中居於多數？郝平認為，儘管我們無法對此作出準確判斷，但是災荒中所呈現出來的女性行為的複雜性和多樣性，以及災後方志記錄者的偏向性，恰恰是晚清中國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特點的重要表現。挖掘災荒時期普通人的思想與觀念，也是作者一再強調的從社會史角度拓寬災荒史研究的努力嘗試。

其三，對民間救災實踐的強調。除了對官方賑濟的闡述外，該書第六章、第七章分別對饑荒中的外部援助，即外國救濟、江南義賑人士的賑濟，以及本省地方紳商的賑濟行為進行了描述。以往研究對丁戊奇荒中傳教士、江南義賑的賑濟實踐及作用關注較多，但是相比之下，對災荒中本省地方紳商的作用則相對投入較少。該書通過對方志中「義行」、「人物」、「鄉賢」、「任恤」等資料的梳理，詳細考察了士紳文人、地方富戶、商人等社會角色在災荒中的救助行為，認為民間群體自發的救濟行為在山西全省非常普遍，作為地方精英的士紳階層或者親自施賑，或者積極動員鄉村社會中的富商大戶進行募捐，或者襄辦賑務，並非方志編撰者刻意選擇而為。通過對山西本省士紳富戶救災的描述，作者認為，來自民間的這些救災舉措「除了

部份追求名利的思想外，更體現了傳統文化長期薰染下民眾的閃光思想與行為」，他甚至由此推斷，就救災機制而言，「民間社會存在一套隱形的有別於國家的救濟系統，在特定的時候會顯現出來，在局部地區和人群中發揮作用」（頁295-296）。

通覽全書，能夠感受到《丁戊奇荒》是作者對此段歷史充滿敬意和溫情之作。作者立足社會史的視野，解讀大災之下眾生相，對於以往多關注災情、災因、災害影響、救災制度的災害史研究，無疑做了十分有益的補充。當然，如同作者所言，限於史料及精力，本書並不能窮盡關於丁戊奇荒的所有問題。比如，丁戊奇荒之前，民間救災只是官賑的一種補充形式，還是有別於國家救災系統、與官賑平行的一種救災模式？如何考量災荒對儒家倫理的衝擊？針對於不少反映大小官吏勤勉救災的史料，吏治腐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着晚清官賑體系的運作？本書未能窮盡的這些問題，應該也會對進一步深化災荒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考。

趙曉華

中國政法大學歷史研究所

張思主編，《二十世紀華北農村調查記錄》（第四卷）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2年，694頁。

20世紀三四十年代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（簡稱「滿鐵」）在華北鄉村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，其中影響力最為持久的莫過於沙井、吳店、冷水溝、後夏寨、寺北柴和侯家營六個村莊，這六個村莊的調查資料被彙編入《中國農村慣行調查》（簡稱《慣調》）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52-1958），該書出版後獲得了日本學者（如滋賀秀三、仁井田陞、旗田巍、內山雅生等）、美國學者（如馬若孟、黃宗智、杜贊奇等）的廣泛關注，並在法制史、經濟史、社會史等多個領域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學術成果。

20世紀90年代，日本學者三谷孝等聯合南開大學魏宏運等學者，再次對其中的五個村莊進行了回訪調查，並模仿《慣調》的問答體例，出版了兩部資料集，包括《農民が語る中國現代史：華北農村調査の記録》（東京：內山書店，1993）和《中國農村變革と家族・村落・國家——華北鄉村調査の記録》（兩卷）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99-2000）。2012年推出的中文版《二